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戏剧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634540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 — 1982

戏剧集

吴雪 杜高 主编



A0949825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7 · 北京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吴 雪 杜 高

主编助理 范 溶 杨景辉

特约编辑 王济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戏 剧 集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58.5印张 6插页 1241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 10355·70 定价: (精)16.85元(平)14.25元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 牧 李 庚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赵 寻

张 庚 孔罗荪 王朝闻

李 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各分集主编

理论一集	李庚	戏剧集	吴雪
	许觉民		杜高
理论二集	朱寨	电影集	陈荒煤
理论三集	王朝闻	电视集	赵寻
短篇小说集	唐达成	曲艺集	陶钝
中篇小说集	江晓天	音乐集	李凌
诗集	邹荻帆	美术集	华君武
散文集	袁鹰		王琦
杂文集	曹彦修	摄影集	徐肖冰
	秦牧	舞蹈集	吴晓邦
	陶白		游惠海
报告文学集	柯岩	书法集	沙孟海
儿童文学集	金近	杂技集	夏菊花
民间文学集	钟敬文	史料集	张炯
少数民族文学集	玛拉沁夫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李景峰	陶国铨
	邢沅	郑荣来	
出版负责人	李湜	陈树彬	方翕之
装帧设计	张慈中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的标准，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全书索引及必要的资料将在适当的时机另行编辑出版。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共二十三集。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部分包括戏剧（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曲艺、音乐（声乐、器乐、歌剧）、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此外，还有一集史料。

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史料集》收选。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注释一律采用原著，凡编者新增加的，均有说明。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

导言

吴 雪 杜 高

选辑在这本集子里的二十二种话剧和戏曲剧本，产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1976—1982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历史性转折时期，也是向新的宏伟目标前进的开始。这个时期是以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志的。

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是这个年代的主要内容。它使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充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蓬勃生气，自然也赋予戏剧艺术以新的生命活力。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崇高优美的戏剧。而人们又常常通过戏剧对时代生活的艺术反映，加深对时代精神的感应。历史的伟大转折和社会生活的急速变革，使这个时期的戏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活跃，迸射出了灿烂的思想艺术光彩，取得了巨大的新成就。

任何一本完美的选集都难以体现这六年中戏剧成就的丰富性；任何一位精明的编选者也都难以在这琳琅满目的佳作中做到准确的选择。即或如伟大的鲁迅，在新文学创作还比较稚弱的年代完成了同样性质的编选工作之后，都难免发出遗珠之叹，那又何况于今天的我们呢？

但当我们读完六年中数百本各种体裁风格的戏剧作品后，却禁不住心中的喜悦。戏剧的帷幕在我们面前揭示了一个繁华绮丽的社会主义艺术的春天。我们不能不怀着满腔热情，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发出由衷的赞美。

当我们编完这本选集以后，我们想起了已故戏剧家洪深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的那本反映我国新兴戏剧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战绩的《戏剧集》。洪深在他写的长篇导言中，确乎敏锐地从郭沫若、

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丁西林等杰出剧作家的早期作品中，预想到了我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必将从与社会生活和人民革命的结合中开辟新路，新兴的戏剧应当反映民众的社会意识的觉醒。从那本《戏剧集》的出版，到现在的这本《戏剧集》，历史走完了半个世纪的路程。中国戏剧事业的规模，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提高和进步，戏剧同人民的关系，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读者仍然可以从这两本选集中看到我国戏剧发展的一个跨度很大的历史轮廓，并将可能感受到我国戏剧创作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

因此，我们盼望反映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战斗成果的选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重要戏剧作品选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1966十七年优秀戏剧作品选集，都能尽快地编辑出版，使读者系统地看到我国戏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的历史全貌。不但可以认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尤其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现在的这本选集所反映的这个六年，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戏剧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新时期，它是怎样从“四人帮”的政治摧残下和艺术禁锢中得到复苏和解放的，以及从它的新的巨大的成就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的特点。

我们以为，戏剧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都应归于时代。只有新的时代才能培育新的艺术。

正确路线下戏剧创作蓬勃发展的六年

1976—1982年，是革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恢复和蓬勃发展的六年。丰富的实践成果向我们表明：党的正确的文艺路线和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是戏剧创作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戏剧创作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我国戏剧遭受了十年禁锢与摧残的黑暗岁月之后，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重又迎来新时代的曙光。广大戏剧工作者在十年中经受了各种不同的苦难，也在政治大风暴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更紧密了，对人民的政治愿望和生活的艰辛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十年的社会动乱，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社会现象，不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并且促使他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对新时代的热烈希望，他们充满诗情，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创作的冲动。就在这个曙光初露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此作为指导全党工作的思想路线。这就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促使艺术创作摆脱“四人帮”的那一套“假、大、空”，重新回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忠实而勇敢地面向现实生活，遵循从实际生活出发，积极地反映生活真实并寻求生活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1976—1979短短三年，各民族戏剧和各地方剧种得到复兴，话剧新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时期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就是文艺思想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举行的献礼演出，可说是中国戏剧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大的戏剧展览。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演出了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歌舞、曲艺和杂技各个艺术品种共137台节目，话剧占了62台，大小剧目68个。除了象老舍的《茶馆》、布莱希特的《伽里略传》这样的经典作品之外，几乎全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包括象《报春花》、《陈毅出山》、《救救她》等这样一批优秀作品。这一大批演出剧目，就题材来说，歌颂革命领袖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16台，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有17台，反映现实斗争和“四化”建设的有19台，革命历史题材、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的有10台。戏剧样式则有正剧、悲剧、喜剧、儿童剧和科学幻想剧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和鲜明性，生活领域的广阔性，社会内容的丰富性，以及艺术风格和舞台形式的多样性，充分显示出话剧创作的活跃，思想与艺术的提高和进步。因此，1979年，被人们称赞为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

话剧创作的繁荣，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文艺现象。这是冲破禁锢后的奔腾，重见光明时的欢唱，完全合乎艺术本身的规律。它不但是对“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的有力反抗和深刻批判，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新时期整个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我曾在为《献礼演出剧本选集》所写的序文中，对这一时期话剧创作的

丰收，作过以下的分析：“首先是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拯救了话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开展和拨乱反正，为话剧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政治前提。同时，中央、部队和地方党委、文艺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政策，贯彻双百方针，关怀和支持话剧创作，组织和领导剧本创作工作，使这批剧作得以顺利完成。第二、是剧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辛勤劳动。我们的剧作家，老、中、青三代人，在十年浩劫中都受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或毒害，对‘四人帮’仇深似海，粉碎‘四人帮’三年来，一批老剧作家焕发了青春，写出了新作；中年作家挥笔上阵，成为创作的主力；青年剧作家不断涌现，是一支崛起的新军。……因而尽管题材不同，所写的时代有别，生活面不一样，但都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让人鲜明看到这是新时期的产物，特别是反映‘四化’的剧作，更能够触及时代的脉搏，触及社会生活的本质，它的主题和人物，洋溢着时代的精神。”^①

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辞》，是一篇纲领性的重要文献。他高度评价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成就，同时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方向，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人民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希望，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邓小平同志满怀信心地预言：“我国文学艺术蓬勃发展，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的脚步迈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主要任务就是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领导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同心同德从事现代化建设，向宏伟的目标挺进。八十年代是充满光明、充满希望的年代，大有作为的年代，也是严峻的充满考验的年代。新的时代向戏剧创作发出了新的召唤，提出了新的要求。

1980年2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三个文艺家协会（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这是紧接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界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中心议题是围绕几个有争议的剧本，就戏剧与电影创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以及与整个文艺

^① 《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剧本选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作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自由的讨论。

胡耀邦同志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以八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实现“四化”必须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学艺术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三座高峰之一。八十年代既是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文艺界向新的高峰前进的起步。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继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以后，党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剧本创作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正确的方法，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和自由讨论，正确地解决文艺创作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精神。也是党在深刻地总结了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以后，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与人为善的态度，造成艺术民主的气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基本理论，引导文艺创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次富有成效的新实践。

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和有威望的理论家周扬、贺敬之、夏衍、阳翰笙、陈荒煤、张庚等同志，也都针对文艺工作者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文艺作品如何真实地准确地表现我们的时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光明面与揭露阴暗面，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和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文艺批评等重大文艺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探讨。

剧本创作座谈会不仅对戏剧创作的健康发展是一个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于整个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对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以剧本创作座谈会为标志，八十年代的戏剧创作，在已经获得的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首先表现在广大剧作者面对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交错的历史时期呈现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保持着清醒而坚定的认识。他们积极而热情地投入人民斗争的火热生活中去，把握时代生活的主流。戏剧

^① 参阅《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作的内容也就从前三年主要反映十年动乱的生活而转向反映新的现实了。于是，一幅幅崭新的生活图画出现在戏剧舞台上，一个个从新的斗争中涌现的带着新的精神气质的时代新人，生动活泼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一批反映农村变革中的新矛盾，洋溢着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欢笑，表现农民新的风貌的剧本出现了，如《张灯结采》（宋凤仪等作）、《赵钱孙李》（栗粟等作）、《落凤台》（房纯如等作）、《吉庆有余》（王治安作）等。反映工业战线的改革洪流冲击着往日的平静，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掀起了波涛巨浪，出现了《血，总是热的》中罗心刚这样热血沸腾的改革者的动人形象。在各条战线忘我工作的知识分子们，扬眉吐气地成为戏剧作品的主人公，如《原子和爱情》（李维新等作）、《祖国之恋》（张镗作）、《迟开的花朵》（王正作）等。再也听不到他们发出“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这一类的哀怨声了，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与信念，激动着观众的心。一部部鼓舞人民同官僚主义者和不正之风勇敢斗争，尖锐地揭露现实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的剧本上演了，《谁是强者》中的袁厂长、《宋指导员的日记》中的年轻指导员，都以不屈的战斗者的姿态，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六年的时间里，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正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在广大剧作家的辛勤的艺术探索和刻苦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着前进着的。我们的这本选集，也就是力求使人们通过有限的篇目，看到这种探索和实践的一个缩影。

话剧战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话剧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从本世纪初在我国的出现，就是顺应了历史的进步要求，而同旧文化、旧艺术鲜明地相对立。话剧在我国社会变动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同代表时代进步的思想潮流相汇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话剧的特点是敏锐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及时地提出和回答现实的迫切课题，反映人民的政治愿望、情绪和要求，传播进步的新思想。因此，在革命文艺阵地上，话剧被认为是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锐利武器之一，长时期来确已形成自己的艺术特征和战斗传统。我国话剧艺术产生了自己的一批经典作，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日出》、夏

衍的《上海屋檐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田汉的《关汉卿》、老舍的《茶馆》等，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代表了我国话剧的水平，代表了我国话剧艺术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为现实而斗争的深厚传统；显示了话剧所具有的强大艺术魅力和它概括一个时代的生活内容所能够和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话剧的这个战斗传统，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特点。

广大剧作者投入了全国人民愤怒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以高昂的战斗热情迅速地写出了一大批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更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的作者都并不满足这些作品仅仅成为一种政治宣传鼓动的工具，这里也凝聚了他们艺术追求的心血。大多数作品力求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艺术的完美性。虽然这一批作品成就的高低并不一致，相当多数的作品也已失去再演的必要，但我们绝不可抹杀它们当时所起过的重大社会作用，更不应该忘却它们的功绩。何况从创作的总体看，不但战斗精神是可贵的，而且也显示出剧作者们美学思想的提高。

文艺史上任何一种巨大的潮流和倾向，总是由一批同时代的艺术家共同的奋斗和努力而汇成的。只不过后来保留下它们当中极少数作为代表的精粹之作，但也毕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和结晶。以揭批“四人帮”为题材的话剧创作，确实汇成了一股艺术潮流，出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竟只能收录《丹心谱》这么一个作品。在它之前出现的政治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作），是刺向“四人帮”的第一支锋利的投枪，对“四人帮”的荒谬绝伦的政治欺骗，进行了叫人捧腹的辛辣嘲笑。接着，两位颇有艺术才能的青年业余作家宗福先和贺国甫，出于对“四人帮”残酷镇压1976年天安门群众运动的政治义愤而创作的《于无声处》，象一声惊雷震动了全中国，开创了中国话剧演出剧团最多，观众率最高的记录。这以后，出现了更多的好作品，我们可以举出：《白卷先生》（陈珪作）、《战斗的篇章》（集体创作）、《婚礼》（航鹰作）、《市委书记》（刘思明等作）、《老师啊，老师》（李婉芬、朱琳作）、《童心》（秦培春作）、《决战》（翟剑萍等作）、《心在跳动》（张弦作）、《哦，大森林》（都郁作）、《峥嵘岁月》（顾尔鐸作）、《出色的答案》

(周正行等作)、《有这样一个小院》(李龙云作)、《为了祖国》(周振天作)、《神州风雷》(赵寰作)、《沉浮》(翟剑萍作)等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十年动乱中的悲惨遭遇和对林彪、“四人帮”的反抗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正面表现粉碎“四人帮”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神州风雷》一剧，江青和她的同伙四个反面形象都出现在舞台上，尤其是对江青的丑恶灵魂作了淋漓尽致的剖露。《神州风雷》和《沉浮》等戏，还在舞台上真实地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斗争。这些感人的场面，使千万观众热泪泉涌，感情激荡，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青年剧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则是把揭露“四人帮”和歌颂革命领袖结合起来，艺术上比较完美的一个作品。较之同类题材的许多作品，它所获得的突出成就，不仅是因为它正确地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也不仅由于它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革命激情和阶级义愤，甚至也不仅仅因为它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而是由于这一切都是按照戏剧的艺术要求，通过对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刻划，通过真实可信的生活场景的描绘，通过洋溢于全剧的浓烈的生活气息，真实自然地表现出来而深深感动了观众的心。这里引用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对该剧的一段评论：“我们确实不难遇到这样的作品，在它们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四人帮’的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作品却没有很好地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其主要原因之一，往往是由于作品没有作到让形象来发言，而只是让某种赤裸裸的思想、概念来说话。只凭某种概念(即使是革命的概念)，是无法构成具体的艺术形象的；只有真正来源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形象，才会有艺术的感人力量。有些作品尽管有着正确的政治观点，激昂的感情，却缺乏深沉的感人力量，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而话剧《丹心谱》，首先就是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值得赞扬的经验。”^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丹心谱》作为这一类题材的优秀之作选入了本集。

^① 《中国戏剧年鉴》(1981)10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塑造老一代革命家舞台形象的时代意义

和揭批“四人帮”的创作潮流相结合，出现了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一幅幅中国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场景，生动地展现在千万观众面前。文艺潮流总是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当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遭到十年的任意篡改和是非颠倒；当着一大批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老一辈革命家蒙受了十年的谣诼污蔑和残酷迫害；当着个人迷信的狂热宣传把人们的思想搅乱了以后，历史严正地要求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人们的思想要求正本清源，人民群众要求为老一辈革命家伸张正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求继承革命传统。这一切客观要求促使话剧创作开拓一个崭新的艺术创造领域，运用艺术的典型化方法，塑造一个个老一代革命家真实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舞台形象。《秋收霹雳》（赵寰等作）、《杨开慧》（乔羽等作）、《曙光》（白桦作）、《转折》（中国话剧团）、《报童》（邵冲飞等作）、《陈毅出山》（丁一三作）、《东进！东进！》（所云平等作）、两部《西安事变》、《滚滚的黄河》（张鸿生等作）、《大江东去》（任卓伟等作）、《朱德将军》（车连滨等作）、《回师北上》（邵兴等作）、《江南一叶》（龙小刚等作）、《陈毅市长》（沙叶新作）、《北上》（李伯钊等作）、《平津决战》（刘佳等作）、《彭大将军》（王德英等作）、《巍巍昆仑》（东生作）、《宋庆龄和孩子们》（任德耀作）等，就都是这六年中创作的以老一代革命家为主人公的优秀剧本。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们都从正面描写我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注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二是不但再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且也深入地描写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思想矛盾，表现出对历史是非的鲜明的评价态度。这就使这批作品既展现出了中国革命无比壮烈的历史画卷，而且大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比较深刻的思想主题。

从艺术思想和艺术表现上，也显示出重大的突破和进步。首先是剧作者们艺术思想的解放。以往的戏剧描写领袖人物，只能在关键时刻露一露面，不说话或很少说话；现在则是作为戏剧的主角来描写，让他们进入矛盾冲突的核心了。更重要的是挣脱了过去把领袖人物神化的思想束缚，注重刻划他们生动的个性特点，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把他们的叱咤风云的伟大革

命行动和亲切的、富有情趣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他们既有革命家特有的胸怀、品质和胆略，又有普通人所有的欢乐和哀愁。这就为塑造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真实而崇高的革命家的舞台形象，克服以往那种神化领袖和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找到了正确的艺术途径。

本集收录的白桦的《曙光》，是描写贺龙同志光辉战斗史绩的第一个剧本。当这个剧本写完的时候，党中央还没有公开为贺龙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戏的演出也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斗争的。当观众从戏剧中看到贺龙同志在极端困苦的历史环境中，同党内错误路线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不能不联想到刚刚结束的十年内乱，思考产生这场悲剧的历史根源了。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的《报童》，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背景，描写重庆《新华日报》的同志和报童们，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戏剧动人地描写了周恩来同志对儿童们深挚的关怀和爱护，同时把这一场斗争的胜利，表现得既生动又亲切。

程士荣等集体创作的《西安事变》，是一部人物众多，纪实性很强的戏剧。它不仅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政治斗争，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著名历史事件，更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作为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同志的崇高形象。

部队作家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在人物性格的艺术描写上，是一部很有光彩的作品。老剧作家曹禺热情地赞扬这个作品，他说：“这个戏把陈毅同志写活了，它使我们看了之后，永久地想念着陈毅同志，决心跟着他前进。他的一生都在激励我们进步。”^①这应该看作是一位老剧作家发自内心的真挚而又朴素的艺术评价。

沙叶新的《陈毅市长》，是又一部具有艺术独创性的剧作。它和上面提到的剧本，在戏剧结构和艺术处理上有所不同，它不是围绕一个贯穿的情节来表现陈毅同志，而是以陈毅同志为中心，描写许多的人物和事件。在这个剧本里，陈毅同志的艺术形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老作家丁玲看完演出后激动地写道：“剧中的陈毅市长是一个伟大的人，却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人。我们需要的是活的人，而不是刻板

^① 《中国戏剧年鉴》(1981)10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